

第五章 結語：非都市地區自發性婦女團體的社區參與潛力

將對研究對象的分析觀察置回女性社區參與的歷史脈絡與相關研究的圖像中，本研究呈現在非都市地區，中老年女性的生活經驗，並且從探究女性參與社區中團體所引發自我與生活的改變，將研究對象這一群中老年女性的經驗納入女性社區參與的圖像中，在此章更進一步試圖以研究發現為基礎，為提升女性意識、爭取女人更大的社區參與空間尋求切入點。

第一節 婦女社區參與經驗的不穩定性

對於中老年女性而言，因為子女長成或離家，母職與照顧責任已經減輕許多，女人似乎應該擁有更多自主的空間與時間，然而從貼近研究對象的經驗觀察與分析中發現，在女性跨出家庭門檻進入社區的過程中，父權體制下賦予女性的妻母角色仍如影隨形，並且深植女性的意識中，影響著女性參與社區的經驗與過程。

媽媽土風舞班的成員在加入團體的過程中，運用策略以獲取離開家庭參與活動的正當性是普遍的現象，團體的領導者為了增進成員們的參與，也必須顧及成員丈夫的感受，包括維持純女性的團體模式、舉辦夫妻可以共同參與的活動並且將土風舞界定在運動的範疇，不與「美」、「舞蹈」做連結，為成員爭取父權的認同，獲得更大的參與空間，顯示父權社會對於女性在家以外的場域現身活動，尤其如土風舞必須展現身體舞動的活動，等同於違背了妻母角色的形象；成員個人則以不影響家內工作的完成與作息為前提，犧牲自己的睡眠時間，換

取外出參與活動的認同。雖然訪問的成員中也有成員表示丈夫會協助看顧孫子，或對於妻子參與社區活動持樂觀其成的態度，但是成員仍表示必須以家庭為重的應先順序，可解釋為女性面對的其實是整個父權社會的體制，形成了女人共同的處境。

婦女參與團體時策略運用的必然，是對於父權社會中將女性限制在私領域中妻母角色的反動，然而這些對女性的禁錮與限制在受訪成員的言談中從未成為談論的對象或內容，反而在不同的成員論述中呈現出單一的、服從父權規範的意識想法與行為準則，如「家庭為重」、「都是孩子離手腳才可以出來」、「也是要先想想看，要是會影響就不敢、就不去了」等語彙所表現出的義含。面對父權社會中，婦女「走出家庭參與社區活動」與「在家庭中作為一個賢妻良母」的衝突，成員們的應對方式是將後者置於第一的優先地位，以換取前者的微薄空間，成員們感覺的此間到衝突，但是並未發展出質疑與對抗的意識。而成員所採取的權宜策略在家庭中出現新的照顧需求時，往往使得身為女性的成員必須中斷社區團體的參與回到家庭中。

此外，成員在團體參與中，因為與他人連結與互動所漸次發展出的自我以及對於主體需求的追求，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在無法違抗、挑戰父權體制的情況下，「新的自我」以極為隱諱的形式與「維護傳統父權價值的主流自我」共存，在成員的生活中成為兩個分裂的部份，成員之間對於彼此追求主體需求的支持與鼓勵是以不驚動父權規範為限度，「收斂」就成為當兩種自我衝突時的解決之道。

雖然女性在團體中逐漸開展的社區參與經驗與自我發展仍受到許多壓抑限制，然而這樣的經驗與衝突開啓了女性主體意識發生變化的可能性，衝突的情況顯示在婦女團體中出現了非單一的價值，並且可能形成改變的契機。

第二節 女性情誼的差異性

女人在走出各自的家庭後於團體中彼此連結所形成的情誼，對於長久孤立於家庭私領域中的女人而言是迷人的，女人在團體中可以彼此分享過去的成長經驗，以及在婚姻、家庭裡所面臨的種種處境與困難，從中獲得了解與支持，破除過去孤立的處境與經驗。Sack(1979)更深一層由生產關係的歷史脈絡分析，指出姊妹關係（女性情誼）對於女人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所隱含一種成人關係的自主性，女人在工業社會之後，因為生產關係的改變，家庭成為再生產勞動的場所，女人在其中從事無酬的的再生產勞動，在經濟上必須依賴男性，使得女性的社會關係中只剩下妻子與母職關係，姊妹情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為公私領域的建立，女性被孤立在各自的家戶中而消失。

在婦女團體中女性情誼的開展指出了女人相似的處境，強調女人從屬的社會、經濟位置，因而對女性主義運動或婦女運動而言，在小型、支持性的純女性團體中提升女性意識是運動的組織常態。對婦女運動而言，女性情誼是具有解放力量的，可以促使女性一致地對抗父權文化的壓迫，然而在一些關於自發性婦女團體的研究中均發現，在團體中發展的女性情誼與女性主義所指稱的存在有差距，不見得具有解放的力量（邱育芳，1996；李宛澍，1996），在我對於土風舞班成員的觀察中也有相似的發現，成員們對於彼此間發展出的情誼具有高度的心理滿足感，甚至認為比親姊妹還要親密，這樣的情誼並且提供成員以完整的自我為主體與他人平等互動的經驗，對於女性重新發展自我有極大的協助，但是在成員間並未觸及對於父權文化的反抗或挑戰，當成員面臨與父權規範的衝突時，情誼並未成為支持個人突破限制的力量，而是扮演著同理的心理支持角色。

這樣的女性情誼或許可以視為是女性意識未開展的狀態，但同

時我們也必須更謹慎地分辨女性不同的社會處境與階級，以避免過分地簡化女性團體的發展問題。在西方的發展中，當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沈醉於女性情誼的美麗時，黑人女性主義者 Bonnie Thornton Dill 就直指女性情誼的限制與危險，她認為女性情誼的概念雖然揭示了女性在父權體制下共享的壓迫經驗，但是卻未揭露不同族群/階級的婦女在生活經驗上的相似與差異(梁莉芳，1990)。女性情誼的概念認為女人解放的基礎在於所經歷的共同壓迫，但是過於強調女人所遭受的共同壓迫，會忽略女人之間的變異與複雜的社會事實。對本研究針對的非都市地區中老年女性而言，在承載了這麼久被支配、從屬的經驗，傳統價值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生活周遭的處境下，斷然地切斷揚棄過去其所信奉的價值並非妥當的做法。「如果持著批判的態度來要求主婦媽媽們放棄個人私領域的事物不管，極力地主張她們應該投入所謂公共事務的參與，這樣等同於是認同與複製男性霸權的觀點邏輯，即認為私領域的價值是低於公領域的（邱育芳，1996:71）。」因而如何引導在自發性女性團體中所建立的情誼力量，發展出適合女性生命階段與所處社會情境的變遷方向，是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第三節 自發性婦女團體的「自助(self-help)」義涵

在社會工作的方法中，自助團體(self-help group)的概念已普遍被使用，是一種「具備相同經驗或目標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們所組織並運作的團體，互相協助或支持彼此。」專業人員在這樣的團體中並未扮演積極的角色，但是團體本身對於個人福祉的改善有顯著的效果。在對土風舞班成員的觀察中，雖然團體是以運動休閒為團體目標號召成員加入，但是女性在串連之後發現彼此在父權文化下相同的生命經驗

與生活處境，原本生活中的問題與狀況在女性聚集之後成為共同分擔的困境與煩惱，彼此交換經驗意見共同解決問題。

更細緻地看自助團體中包含的助人要件(helping characteristics)，Schiff(2000)在其研究中提出有五項：1.問題的普遍性以及脫離孤單的感受；2.支持，包括同理心與情緒表露宣洩；3.教導並學習因應技巧；4.傳達經驗到的知識；5.灌注希望。在研究案例的媽媽土風舞班中，成員走出家庭參與團體破除了過去在家庭中的孤立，在團體的互動中建立姊妹情誼網絡，分擔彼此的問題或情緒，並且確認彼此為友；女人的知識是「經驗」與「實作」的，這樣的知識在過去各自的家庭中是不被看見的，然而在團體情境中，女人的知識互相交流、被重視肯定必且逐漸累積。這些在女人團體中發生的事一點一滴地幫助女人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提升個人福祉，因此，我們可以說自發性的婦女團體是極具有「自助」特質的。

然而與社工論述中所指稱自助團體不同的是，先前提及成員參與社區經驗的不穩定，是來自於婦女面對父權規範時採取妥協、以家庭需求為優先的因應策略，面對狀況的回應其實反應了依從父權規範的意識；自助團體中必須灌注希望的要件意指團體能給予成員面對難題時，能將困境視為一種挑戰以及成長的誘因，並增加對狀況的控制能力，需要的是一種處理情境的「意識形態」，能夠達成個人與社會兩者共同改變的目的。對於研究案例中的中老年女性而言，母職責任鬆綁為成員提供了一個走出家庭與其他女性在社區中串連的機會，但是這樣一個新生的社會空間在遇見與傳統家庭價值的衝突時，變得模糊難辨。母職對於女性的限制與壓力隨著生涯進展與子女成長而緩和，然而緩和的是唯物層面的責任，在其心理與意識上深植著父權體制下塑造的傳統女性角色。

對於中老年女性而言，藉由團體集結的形式在過去陌生的社區

領域中佔有位置，對女人而言是重要的、不同與以往的特殊經驗，婦女團體中將男性隔離、「自助」的情境與經驗，為女人的自我開啓了變動的無限可能，並且在這個節點上，女人能夠從跨越公私領域的衝突中意識到自我處境與父權體制的關連，而是能否進一步強化鞏固女人自我與生活空間的進展，端看團體中是否發展出或引進能與傳統父權抗衡的女性意識，於下一節的討論中試圖提出可行的方向。

第四節 連結婦女運動：鬆綁父權意識的契機

從前面的論述中，土風舞班的成員們正處於母職責任鬆綁的階段，因此得以離開家庭參與社區，但是因為成員們家庭主婦的身分，不僅感情上與經濟上依賴核心家庭，同時也是長久以來身分認同的來源，父權意識的緊箍在家庭主婦身上並未隨著女性的生命階段發展而鬆綁，因而自發性的女人團體必須跳脫停留在情緒抒發團體階段，進一步發展出更具力量的女人觀點與意識，在此我認為在原本女性網絡厚實的基礎上，連結婦女運動資源引進不同的價值與衝擊，是將女人集結所帶來改變契機發展為意識開展與集體行動的可行方向。

對於婦女運動而言，愈來愈將家庭主婦視為婦女改革的潛在動員群，但是不可諱言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婦女而言，家庭主婦的改革潛能也是比較弱的，Oakley(1976)對此提出她的看法，認為家庭主婦對於婦女運動明顯抱持負面的態度，一方面因為資訊在其生活中並不充足，另一方面從媒體上得來的刻板印象是其激烈、憤怒的運動方式；大多數婦女對於婦女解放的信念都保持極為保守的態度，想要維持婚姻的現狀，並不覺得應該去除女性的傳統家庭責任，也不認為應該由丈夫來分擔。其根本的障礙在於家庭主婦對於傳統定義的女性角色有

強烈的心理認同，Oakley 進一步論述其實家庭主婦的認同較其他女性強烈並非必然，但是她們在社會化過程中被灌輸家務與母職為女性職責，以及其他與家庭主婦相關的社會安排，形成了一個「極為封閉的傳統女性世界」，使其難以跳脫看到範圍以外的世界。

然而家庭主婦所處的封閉世界，在女性走出孤立的家庭進行集結之後，展露了改變的可能性，例如研究案例媽媽土風舞班在團體中開展出的自助特質與女性情誼，是為女性鬆綁社區父權意識開啓的一扇窗。以團體形成來看，媽媽土風舞班並非在國家所主導、形塑社區女性刻板角色設定（以家庭中再生產的角色定義社區女性）之內，自行籌組集結的女性團體網絡在社區中的位置與角色有更多彈性變動的空間，並且成為社區中潛在的、重要的女性網絡。

婦女運動與自發性女人團體連結或對話，將不同的女人族群串連可以突破後者因為同質集結的傾向，強化傳統主流家庭價值的可能性，在彼此的差異中使自己的處境與主體性逐漸清晰；而對於婦運而言，進入以家庭主婦為主的女人網絡中的論述必須將焦點放在日常的生活知識以及切身的問題上，以提高論述在其中的合法性；社會工作體系包括團體或社區工作必須重新檢視過去以發展階段定義婦女需求的觀點，重視女人主體的需要與聲音，與女性共同工作的過程中，同時注重意識中的衝突以及女性意識的開展。

雖然對於家庭主婦尤其中老年女性而言，在走出家庭與發展自我的過程中有許多選擇上的限制，並且長久以來傳統父權文化正是她們身分認同與生活信念的根源，在這樣的處境下即使因為父權的限制與壓迫而痛苦焦慮，都無法使她們斷然揚棄傳統父權的家庭價值。然而我們相信女人的集結的力量不僅將女人處境與問題公共化，更能夠發展出女人文化與女人觀點，從改善女人的生活品質與處境開始，提升女人的個人福祉，當婦女本身知覺改變的需要，則壓迫婦女的結構

將被改變。